

## 闲谈散文

高定存

在各类文学创作中,散文的题材与形式最为宽泛,最自由。大到社会变革,朝代更迭,小到花鸟草木,丝缕感情,长短不拘,皆可成文。但有一点,无论写什么,最好是心有所动之后再动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寄情于文,以情动人,这是散文写作的老生常谈。

无论什么题材,文学最终要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即使写苦难,苦难中也该透出一丝亮色,用诗人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光”,要给人以前行的勇气,不能让人绝望。

散文也有真话与假话之分。一味渲染夸大问题,抹黑社会自是不可取,但刻意迎合时势,违心赞美,粉饰太平,也非正道。表扬能激励个人进取,批评可促使社会进步。文章要有风骨,作家要有气节。

能否虚构,是散文写作争论已久的话题。有人说读散文就是为读那一份真实,读那一份感情,读那些优美的文字,如果虚构,还不如去读小说。也有人说,散文可以适当虚构一些细节,伟大如《史记》者,也有一些虚构之处。比如《鸿门宴》一类的场景和人物表情,刻画得栩栩如生,但司马迁不在现场,其时也没有影像资料,在场人物也早已作古,那些生动场景岂不是老先生想象而来?两种说法,好像都有些道理。愚以为,散文可以适当渲染氛围,但不能虚构情节,哪怕是一些细节,也不应虚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散文的第一要素。语言不只是一种技巧,一种手段,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目的。写散文实质上就是写语言。文章的气韵节奏等,全由语言控制。我们看一篇散文,有时候并不是要看什么曲折的故事,新鲜的思想,而是要欣赏那一种独特优美的语言。如果有很好的语言,很独特的风格,即使所说是一块石头一朵花,没有多少深刻意义,但也能成为一篇优美的小散文,如同一支小夜曲,让人从中领略到一种纯粹的美。

语言不过关,散文很难立起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使所写是伟大的社会变革,即使所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语言拉胯,文章也难以留存。散文的要害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说,这也是所有文学作品的通理。事实上,几千年来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从内容到主题,大多是一种重复。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但“人生代

代无穷已,人性年年只相似”,几千年来,虽然社会形态有所发展,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但深入一步来看,几千年来人性并没有多少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多少变化。文学是写人的艺术,人性不变,人与人的关系不变,文学作品的主旨也变不到哪里去,写来写去大多是一种重复,新思想新观念实在是少而又少。所以能有新作品源源不断问世,只因写法各有巧妙不同。

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文章能写到语言惊人的地步,至少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能吸引人多看几眼。汪曾祺先生说:“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语言最是考验作家功力。

现实世界只是时空长河的一个瞬间,人类社会急速前行,回头看,会有许多新感受,新发现。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事情,青萍之末,后来成了卷天飓风;当时许多虔诚所为,后来成了笑柄;当时以为是史诗般的正剧,后来看来简直就是儿童游戏。回眸历史不难发现,许多时候,历史缺乏的是细节,而不是框架。英雄逐鹿社稷兴亡之类的大事,自有专家学者在记录;而民间小事,百姓生活,却更能从细微之处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

而今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世界好像被谁给按下了快进键,最近三四十年的变化,简直能超过此前上千年变化的总和。巨大的变化催生出了无穷的故事,许多故事远比小说还生动,还有趣,还离奇,还苦难。所有这一切,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无穷的素材与空间,值得我们去认真书写。再过百年,世界何等模样,实在难以知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将来纵然高楼大厦,金碧辉煌,但后人看我们记录下的这些人物、故事、场景,亦如我们现在看百年前的老照片一样,既会感到新鲜与亲切,也能引发深深的思考。

(高定存,山西省保德县人,1957年生。1982年1月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散文》《美文》《山西文学》《黄河》等杂志上发表作品若干。曾获《黄河》年度优秀作品奖、《山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一些短篇收入几册选集。出版有散文集《黄河往西流》《祖辈的黄河》《书路散记》。)

高定存《祖辈的黄河》

高海平《太阳很红,小草很青》

获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

## 两位获奖作家畅谈散文创作

## 故乡是一个名词

高海平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那年,我考上了大学,离开村庄时,我把铺盖卷、生活用品,还有故乡,一并打包带走。也许是一句戏谑之语,但是故乡一直装在我的心里。几十年来在外漂泊,无论走到哪里,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只要能跟故乡挂靠上的第一时间一定想到故乡,想到故乡那些与眼前所见所闻相匹配的事物,心中有个对比,哪个更好哪个更优秀。故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不但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是我写作的底色。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业余时间不间断地从事散文写作已有30多年,虽然曾经也写过小说,后来还是觉得散文更适合自己的秉性和气质。写作题材首先选择的就是故乡,写故乡的山水、人文、风俗民情,把自己多年来对故乡的观察和了解,以及道听途说的,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描写出来,这是一种纯天然的描写,当然夹杂了很多感情色彩。

离开故乡后,回去得很少,有事回去走走,看看熟悉的人与物,难免感慨万分。大地不会衰老,大地上的事物会改变,人亦今是而昨非。旧时的家园毁弃殆尽,其中发生过的故事已消失,这是时光坚不可摧的力量所致。这一切只能通过文学留住,而我责无旁贷。身在城市的我心在故乡,所谓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也。每每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两眼观望的是街道两旁的树木、花草,以及立足其上的鸟们,远眺的往往是绵延的西山。到农贸市场采购,也要在新鲜的蔬菜上摩挲半天,感受土地的味道和泥土的芳香。尤其是看到面粉、小米等物资,想到的是这些粮食的前身。夏季的麦田,金灿灿的小麦个个像站立笔直的战士,迎接严酷的火热朝天的场景;秋天的田野,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低头沉默无语的样子。这些都是乡土记忆,这些记忆不断激活写作的欲望。

写作过程是一个畅快的过程,沉浸其中不可自拔时,冥冥之中一个灵感会猛然停住笔,有个声音提醒着:故乡那么好为什么还要离开呢?是啊,我开始思索,反复思索着。后来发现原来顺势而为一泻千里的叙述和描写,不完全能表达自己所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需要有适当的思考和批判,这就涉及到了所谓的乡愁意识。

乡愁,是作家喜欢抒写的一个主题,谁没有写过自己的故乡呢,不管大作家还是籍籍无名之辈。乡愁不是简单的对故乡的思念和赞美,它包括对故乡的深刻认识而不仅仅停留

在表面。作家在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后,站在一个更高的视域和境界审视故乡,发现故乡被歌颂和赞美的背后,掩藏着很多落后的、愚昧的、封建的,甚至丑陋的东西,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阻滞了故乡的发展,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首当其冲地毫不犹豫地给予揭示和批判,才是乡愁的真正含义。写作思路的改变,表面看是文风的改变,其实质是观念的改变、认识的改变。

从故乡走出来,蛰居城市,城乡之间的对比时时处处都会存在,城市有城市的喧嚣,乡村有乡村的宁静。特别是这些年,由于环境的改善,很多以前只能从故乡见到的鸟类,在城市里随处可见,比如斑鸠,每天在我的窗户外飞来飞去,有时候在公园里看见它们在地上摆着肥胖的身子一扭一扭毫不怯人的姿态,很能产生一种共情。从斑鸠进入城市而且生活得悠然自得的样子,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斑鸠的眼里,我是不是也和它们在我的眼里一样呢?我一度因为在城市里没有看到燕子而耿耿于怀。去年春天的某个早晨,我刚出楼门,看到几只燕子从我眼前滑行般飞过,心头一喜,原以为燕子只在故乡的屋檐下呢。

由斑鸠看到了城乡之间的某种融合,二者都立足于大地之上,区别在于故乡更接近地气,城市接近人气;故乡有浓浓的人情味,城市散发着铜臭味。发现这个特点以后,我抒写故乡和乡愁有了别一的色彩,笔下的故乡和乡愁,有了一份恬淡和从容,不再像以前那样纠结和迷茫。因为,城市和乡村之间,某种意义上达成了种和解,从而在精神和感情上解脱了我,让我能够笔直地站在文学的高岗上举目回望。故乡变成了一个名词,我当年连同铺盖卷、生活用品一并带走的故乡,以名词的身份进入了我的作品,我像驾驭别的汉字一样驾驭着它,运用着它,它也不再以特殊的身份出现。

(高海平,笔名高乾,1962年2月生,山西乡宁人,现居太原。1985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开始发表散文作品,曾在《光明日报》《中华散文》《山西文学》《黄河》《四川文学》《美文》等报刊发表散文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散文集《带女儿回家》《一抹烟绿染春柳》《我的高原 我的山》《太阳很红,小草很青》四部。)

## 历史

“然仰韶陶器,有与三代铜制鼎鬲相逼似者,且当时陶工已用磨轮,皆足证明其时代与中国有史之时相去不远,当在去今四五千年前之间,是即远在巴比伦之后。如果流传,则必自西东传矣……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然欲完全解决此问题,为日尚远。是在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及语言学家通力合作,去固执之成见,为诚实之讨论,庶能渐达真理。”为了验证他的这一假说,找到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证据,1923—1924年,安特生又在他设想的西方文化经新疆传到中国东部必经的道路——甘肃和青海寻找中国史前的文化遗存。在黄河的支流——

西宁河流域发现了彩陶;在洮河流域,发掘了多处文化遗址和墓葬。1925年6月,安特生在《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上发表了《甘肃考古记》,李济为该文所附载加拿大解剖学家、人类学家步达生(1884—1934)的《甘肃史前人种说略》一文作了中译。安特生在“导言”中不无自豪地说:“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足迹所涉,几至甘肃省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器皿,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藏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相较于《中华远古文化》,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对中国文

■ 作家出版社  
17  
苏 华 著



《大禹禹都》

■ 山西经济出版社  
82  
王宏伟 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化“西来说”更为坚定,认为“西来说”是“已经考证之事实也”。对于安特生的这次西北考古活动,时在伦敦大学留学的夏鼐评论道:“安特生之考古工作,以沙锅屯所作最佳,仰韶村次之,至于甘肃的考古工作,仅代博物院购古董而已,无科学精神可言。”

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学者、教育家,公木创作了大量的经典歌词,像《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

行曲》,以及《英雄赞歌》等,而曲作家、音乐家刘炽更是为人们所熟知,创作了《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和《英雄赞歌》等优秀作品。两人珠联璧合,词曲相映,共同演绎了歌坛佳话。又好像冥冥中相约,两位老人同年同月牵着手鹤而去。

据相关资料称,应邀撰写歌词之前,公木曾作过一首名为《烈士赞》的诗。接到为电影《英雄儿女》创作歌词的任务之后,公木感觉自己这首诗与《英雄儿女》是如此相映成趣,仿佛正是为电影提前准备的主题曲。

战火中唱响的少儿歌曲

近代思想启蒙者、戊戌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充分表达了中国近代仁人志士给予少年儿童的殷切期望。人民领袖毛泽东对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极为重视,先后十几次为少年儿童题词,如“好生保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等,鼓励、关怀、呵护和期盼之情溢于言表。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有生力量。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有远大理想、有文化知识、有进取心和创造力的优秀青少年是祖国永葆青春的重要保证,是民族独立富强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重要基础。